



# 莫言《晚熟的人》中的 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特征及人性观照

□周倩（铜仁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

**【摘要】**莫言在《晚熟的人》中将叙事角度从在乡转向还乡、叙事方法从传奇回归现实，自我视角在故事中不断跳跃，充分展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叙事张力。故事在无关宏旨的日常叙事中展开，却依旧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无论是小说中人物命运跟随时代沉浮的审视，还是对复杂多样的人性的客观描摹，都展现了作家对时代进程中乡土的关注、对人性价值的关怀以及对善良的期待。

**【关键词】**莫言；晚熟的人；乡土小说；叙事特征

作为当代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莫言的作品根植于故乡高密东北乡，以丰富的人物形象、多元的叙事手法、充盈的审美内核，为读者呈现出故乡精彩鲜明、众声喧哗的人文状貌。在当代中国，莫言作品以其丰富的文学内涵备受学界关注，国内外关于莫言的研究成果颇丰，包括对莫言的创作风格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研究、莫言对西方文化的借鉴研究及莫言与中外作家比较研究等。《晚熟的人》是莫言自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睽违8年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是莫言在获奖后对自我的创新与突破之作。书中收录了他自2012年到2020年间创作的12篇作品，12篇作品虽为作家跨越8年间断创作，但总体延续了莫言根植乡土的审美内核，记叙了作家莫言在获奖后返乡时对记忆中故乡人事与当下对比的体悟以及作家莫言回顾与文坛众友的互动记忆对自我的审视。莫言在《晚熟的人》中将叙事角度从在乡转向还乡、叙事方法从传奇回归现实，自我视角在故事中不断跳跃，充分展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叙事张力；虽不同于以往作品，《晚熟的人》中故事在无关宏旨的日常叙事中展开，却依旧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化进程重导致的人性悲剧的关照与善良本性的追求。

## 一、《晚熟的人》中的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特征

乡土文学源于鲁迅的《故乡》，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莫言很小就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在随后的文学创作中也深受鲁迅的影响，更毫不讳言自己是鲁迅的直系传人。莫言曾说：

“作家写故乡就是一种命定的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无法回避的。”在《晚熟的人》中，我们看不到莫言以往的咄咄逼人和怪诞风格，却通过作家朴拙自然的语言，从这个本地作家眼中认识了一个个生活在故乡高密东北乡的鲜活形象，跟着莫言的乡亲经历时代变迁给乡土世界带来的复杂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认为，《晚熟的人》给人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是回到本乡本土。”无论是多样的叙事结构、还是多重叙事视角，都极富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

### 1、时空交融的叙事结构

对小说的艺术性而言，叙事结构十分重要。“传统的乡土小说多采用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前发展，新世纪乡土叙事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形态。”在《晚熟的人》中，作家虽舍弃了以往瑰丽奇幻的传奇性叙事，选择以现实性的白描展开叙述，但仍凭借变化多样的叙事结构及高超的叙事技巧突破了现实逻辑的桎梏。《晚熟的人》既没有简单的线性叙事，也没有采用复杂的叙事迷宫，而是采用了时空交融的叙事结构。比如故事《左镰》中“我”关于那个手持左镰割草的少年田奎的记忆在夏天槐花开放时铿铿锵锵的打铁声中来回穿梭，割草少年因早年间被冤枉欺负了村刘老三的傻儿子喜子，被他爹田千亩砍掉了右手作为惩罚，多年以后娶了死了两任丈夫被传克夫的喜字姐姐欢子为妻。又如《红嘴绿唇》中，“我”的记忆从己亥岁末见到“高参”切换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夏末秋初后又回到与她互换微信的第三天，当年那个当了红卫兵头头较下李老师头发拧成鞭子抽打李老师的“造反派”，后来攀附权贵出卖朋友、如今被称作“高参”的覃桂英，



随着时代的变迁变成了在网络时代兴风作浪的“网络大V”。叙述中，作者有意将时空错位，让田奎和覃桂英的形象在“我”的回忆和当下现实来回之间更加丰满，无论是田奎当年被冤枉时的未予辩解，多年以后对欢子感情婚姻史的宽容态度；还是覃桂英在十一岁时任由本能在动乱年代报复老师，又在时代大潮里利用网络为自己造势，都呈现出一种时空“轮回”的概念，或许当下就是对过去的重复。

## 2、多重的叙事视角

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的一大特征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运用。在小说集《晚熟的人》中，莫言不再通过“我爷爷、我奶奶”讲故事，采用第一视角亲自下场把故事娓娓道来。全书12篇作品中除了《天下太平》，每一篇都有“我”的身影。比如《斗士》中听母亲悄悄细数武功作恶史的“我”，《贼指花》中与文坛众友同游松江被怀疑偷窃的“我”，《表弟宁赛叶》中被借酒劲排解心中不畅一阵揶揄的“我”……故事中，第一人称的使用使读者更易被代入，无形中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同时，第一人称的使用证明了故事的真实性、亲历性，在原本虚拟创作的小说中营造了一种仿似真实的虚拟氛围，让读者对故事所表达的情感内涵有更强烈的感受。《晚熟的人》中的“我”不仅在场，还随着故事发展不断变化的。一方面，故事中有年少的“我”，如《地主的眼神》中“我”因一篇关于老地主眼神的作为让孙敬贤遭殃并与他发生矛盾，年少的“我”随即看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下老地主孙敬贤的遭遇与无奈；《斗士》中的小学二年级在人群中围观武功跟人打架的“我”，年少的“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弱者的一生；另一方面，故事中还有成名后的“我”，如《晚熟的人》中成名后的“我”回乡后看到，自从在家乡拍了“我”的作品《黄玉米》，家乡迅速抓住商机建立影视基地发展影视旅游，村里的人都借机发了财，就连当年村里无人不知的傻瓜蒋二都摇身一变成了“晚熟”的蒋总；以及《表弟宁赛叶》中面对心怀文学报复却郁郁不得志的表弟借酒发泄不满时遭遇人情冷暖的“我”。跟随少年时期“我”的在乡及成名后“我”的返乡，读者以跳跃的时间视角往返于作家的记忆与当下，在历史与

现实中穿梭，与作家一起感受作家对故乡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性本质的多维度呈现。

## 3、多样的叙事方式

“21世纪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从作家的笔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式的日常叙事。”这一点在《晚熟的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中，作家一改往日的宏大叙事，不再执着于塑造一个作为有机整体的乡土世界，而是实实在在地关注故乡的人物和记忆中故乡的朴实日常，曾经生活的故乡和一个个具体人物在记忆中炙热下午的村南池塘边上、在电影放映日的农场篮球场上、在江风凛冽的松花江豪华小游船上变得鲜活起来。在采用碎片化日常叙事的同时小说还采用了元叙述手法，“元叙述指向自己以及那些构成叙事、交流的成分，讨论自己、自反指涉，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叙事体验。”作家在《晚熟的人》中多次以现实中莫言的视角与读者对话，向读者暴露自己在创作中的心理活动。比如《等待摩西》中作家讲述了柳卫东（柳摩西）抓住时代机遇致富后离奇失踪，妻子马秀梅苦苦坚持寻人的故事。在故事中他写道：“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发表这篇作品，是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故事没有结束。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合常理。我总觉得白发苍苍的马秀美这样苦苦坚持着往货车上贴寻人启事，总有一天会有个结果。中国戏曲的大团圆结局模式符合我们的心理需求”，随后提笔续写了故事的结局。叙事中作家用元叙述的视角打破了第一人称视角对读者的操控，帮助读者跳出故事框架，对故事内涵进行理性思考。

## 二、《晚熟的人》中的人性观照

### 1、复杂多样的人性

《晚熟的人》是作家对童年记忆及成名后人生际遇的独特记录，用12篇故事记叙了自己成名后返乡对故乡风土人事的再体悟以及作家的自我审视。小说中，作家收起了他一贯的奇特想象与宏大叙事，转而关注市井凡夫的日常，看似拙朴的叙事实则是在时代变化的境遇中对生命与人性的探索。《晚熟的人》中的众多人物并无纯粹的好坏善恶之分，比如《斗士》中的武功，他是贫苦无依因不肯讨好村干部被欺辱的可怜人，他又是睚



眦必报争强好胜的恶人；《地主的眼神》中的孙敬贤，他是装病逃避改造、欺负儿媳的坏人，也是因多买了三亩地被划为地主饱经阶级斗争的可怜人；《晚熟的人》中的蒋二，他是因为晚熟吃到时代红利致富的幸运儿，也是随时代沉浮受制于时代的无奈者；《天下太平》中的张二昆，他是有手腕有魄力的乡村治理者，也是背地里有权钱交易的嫌疑人；小说的人物还有《诗人金希普》中坑蒙拐骗毫无羞耻心的金希普；《红嘴绿唇》中攀附权贵、过河拆桥的覃桂英；《贼指花》中亦正亦邪的武英杰；《表弟宁赛叶》中的自大狂妄、怨天尤人的表弟；《天下太平》中不作为的警察；《左镰》中善良偏执的田奎；《澡堂与红床中》散发奶香坚持原则不受红床诱惑的小汪媳妇……从小说复杂多样的人物群像中可以看出作家记忆中的乡土正经历着深刻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崩解重建，莫言通过“在乡”记忆与“返乡”现实对时代变迁中人性的复杂与生命异化进行了暴露，也对人性中的美好执着探索，体现了作家对生命意识与人性的关照。

## 2、对善的期待

《晚熟的人》中人物众多且各具独特性格，在一众人物中，作家表现的更多是小说人物人性中的扭曲丑恶面，通过对人性丑恶面淋漓尽致的暴露来衬托人性中善良的可贵及作家对善的期待。小说最后一篇《火把与口哨》，作家说这是他最不想讲又不得不讲的故事。故事中的三婶一生坎坷，婚后被丈夫的好友凌辱，丈夫因矿难去世，儿子在三婶外出时被狼叼走，唯一的女儿却因难以忍受三婶的误解服药结束了生命。她忍受巨大悲痛含泪找到狼窝，在确认狼叼走儿子后砍死狼为儿子报仇，七天后安静死去。作家通过三婶的悲剧启发读者思考，故事的最后虽然仇报了，但人都没了，故事里的三婶还有其他选择吗？如《等待摩西》中的马秀梅，她怀着虔诚的心，数十年如一日向过往货车贴寻人启事，等待丈夫30余年，尽管丈夫失踪期间生活凄惨，当消失的丈夫突然出现，她依旧保持善良接纳丈夫，保持初心经营生活；《澡堂与红床》中为“我”按摩的女子，凭初心择偶，未因事业的失落自怨自艾，更没有因为金钱的诱惑放逐自我，坚持原则平衡家庭，善良对人乐观生活；

《左镰》中因被冤枉欺负傻瓜喜子被父亲砍掉右手的田奎用一句“我敢”娶克死两任丈夫的喜字姐姐欢子为妻，与过去一名恩仇……故事里的三婶有其他选择，选择接受命运的捉弄、选择隐忍坚守、选择善良。

《晚熟的人》中莫言放弃了以往的奇幻风格和宏大叙事，植根于故乡东北高密乡，用自然拙朴的语言记叙了自己成名后返乡对故乡风土人事的再体悟以及作家的自我审视，采用时空交融的叙事结构、年少的“我”与成名后的“我”的多重叙事视角、日常叙事及元叙述叙事方式，从在乡到返乡、从传奇到日常，让读者跟随作家在记忆与当下、历史与现实穿梭，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对时代变迁中人性的复杂与生命异化进行了暴露。无论是对小说中人物命运跟随时代沉浮的审视，还是对复杂多样的人性的客观描摹，都展现了作家对时代进程中乡土的关注、对人性价值的关怀以及对善良的期待。

## 【参考文献】

- [1] 李晓晨. 莫言《晚熟的人》：“他回归故里，用左镰写作”[J]. 文艺报, 2021(7).
- [2] 林莉莉.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审美变化与创作成就[J]. 淮阴工学院学报, 2021(8).
- [3] 王正中. 元叙述的叙述功能[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6):44.
- [4] 莫言. 晚熟的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20.

